

從經濟形態探索珠江三角洲 先秦文化之源

古運泉

根據地理學家對珠江三角洲古地理環境的研究，大約距今6000年前，這裡仍是以廣州為頂點的漏斗狀海灣。其後，由於海平面的波動，和珠江流域的三大水系，即西江、北江、東江從上游帶來的大量泥沙，使珠江三角洲自北向南至唐代逐漸成陸^①。在這些地區大量的考古發現表明，大約在距今6000年左右，我們的先民便在這一地區生產、生活、繁衍，並創造了具有鮮明特徵的古代文化。面對眾多的考古發現，我們最終要回答一個問題，就是先秦時期生產、生活於珠江三角洲的古代先民是從那裡來的？是沿著海灣從東西部而來，還是從珠江水系的西江、北江、東江逐漸遷徙來的呢？本文試從廣東和港澳地區眾多的考古發現中回答這一問題。

一 珠江三角洲先秦文化遺存的分佈和特徵

珠江三角洲一般係指北自廣州石門水以下，西北自三水思賢潭以下，西自潭江以下，東至東莞石龍以下地區，包括三水、南海、廣州、番禺、增城、順德、佛山、高明、鶴山、江門、新會、東莞、中山、珠海、深圳、斗門等縣市和香港、澳門地區，面積約一萬多平方公里。據不全統計，在這一地區發現的先秦文化遺址有二百多處。其中深圳、珠海、南海、佛山、中山、香港等地較為集中。在珠江三角洲中北部的佛山、三水、南海、東莞、增城、高明、鶴山等市的遺址為貝丘遺址或山崗遺址，而以貝丘遺址為多。南部的深圳、珠海、斗門、中山等市縣和香港、澳門地區則以沙丘遺址為多，亦有部份山崗遺址；只有新會市兼有貝丘和沙丘遺址，該市的沙丘遺址位於南部，貝丘遺址位於北部。

在珠江三角洲的先秦遺址中，地層堆積較

好，遺物較為豐富的貝丘遺址有增城金蘭寺、東莞企石萬福庵、虎門村頭、佛山河宕、南海大同灶崗、螺崗、西樵魷魚崗、丹灶通心崗、三水銀洲、新會環城羅山嘴、沙堆炮台山，在珠海三角洲頂端的高要縣廣利鎮（今肇慶市鼎湖區）有蜆殼洲遺址；沙丘遺址有中山南朗龍穴、深圳市大鵬灣咸頭嶺、葵涌大黃沙、小梅沙、大梅沙、珠海淇澳島後沙灣、三灶島草堂灣、前山南沙灣、香洲稜角嘴、平沙水井口、棠下環和香港南丫島大灣、深灣、春坎灣、大嶼山東灣、銅鼓洲、蟹地灣、赤鱸角虎地灣及澳門黑沙灣；山崗遺址有深圳南頭鵝哥山、蚌地山和南海市西樵山等。

這些遺址出土的大量遺物清楚地表明，秦之前，這一地區的先民以漁獵為他們主要的謀生手段。通過對各遺址的地層堆積和器物組合的比較分析，可以看出，由於自然環境、漁獵對象和時間上的差異，先民使用的生產工具亦存在著差異。

甲 自然環境的差異

廣州地理所李平日先生等揭示的珠江三角洲濱線演進過程表明，距今6000年前後，廣州、佛山以南、西樵山以東、東江的赤嶺峽以西的廣大地區尚在海中。至距今4000年前後，番禺以南，江門、新會以東，東莞虎門、深圳以西地區則仍在海中。4000年前後的濱線表明，現在中山、珠海和香港境內的許多大小山丘在當時是海中的大小島嶼。這些島嶼上的大小海灣^②，由於其地形相當隱蔽，島上沖刷下來的泥沙容易淤積，加之伶仃洋上潮海潮的頂托，使帶著泥沙南下的珠江水流在這些灣內出現緩慢的沿岸流，將泥沙沉積於此，使大小海灣成為沙地。灣內有島上

Gu Yunquan : Deputy Director, Guangdong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hina

古運泉：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

流下來的淡水，有沙地前的大片灘塗，有豐富的水產和良好的避風海灣，有可墾殖的山前坡地，這都為先民們提供了良好的生產生活環境。

乙 食物資源的差異

珠江三角洲中、北部的貝丘遺址，多為先民們撈取海中的貝類食用後堆積於住地附近而成。自然環境的差異，其食用的貝類亦有差別。河岸型貝丘的貝類以淡水種為主，有河蜆、圓田螺、麗蚌等，以河蜆最為豐富，半鹹水種或廣鹽性種屬較少，鹹水種屬基本不見。高要蜆殼洲、南海灶崗等遺址屬這一類；海灣型貝丘以半鹹水種或廣鹽性種屬為主，有牡蠣、蚶、蛤等。東莞村頭、新會羅山嘴等屬於這一類；河—湖型貝丘位於鹹淡水交界處，上述兩種類型的貝類在這裡都有。增城金蘭寺、東莞萬福庵等遺址都屬這一類⁽¹⁾。在這些遺址中，除不同的貝類外，還發現了許多魚脊骨、鰲甲及豬、牛、鹿、狗等動物的骨骼。有的獸骨有經火燒和敲砸的痕跡，說明他們還捕魚或獵取其它動物作為食物。在佛山河宕、南海灶崗、東莞村頭等遺址中都有大量的獸骨與貝類共存。河宕遺址出土的豬、狗頸骨經鑑定，已屬家養⁽²⁾，表明他們已掌握了飼養動物的本領。

在珠江三角洲南部的沙丘遺址中，不見貝類的堆積，也很少留下動物的骨骼。一種可能是生產生活於沙丘遺址的先民在遺址附近有豐富的魚蝦等水產資源作食物，不須要再採集貝類作食物；另一種可能是他們食用貝類後，「為避免動物、貝類腐肉引起不潔，沙丘遺址的居民很可能將垃圾傾倒在當時海浪能沖擊到的海濱，經過幾千年滄桑，貝殼、獸骨已蕩然無存」⁽³⁾。

丙 器物組合的差異

不同類型的遺存之間存在著差異，從同一遺存的地層疊壓關係上也可看到因時間的早晚也存在著差異。沙丘遺址的陶器以釜、罐為主，以釜的數量最多，還有豆、鉢、器座、支腳、鼻甬形器等。其中夾砂陶的比例最大，不少遺址都佔百份之九十以上，紡輪

的數量少或沒有；貝丘遺址的陶器以釜、罐、壺、盤(豆)為主，也有鉢、支墊和陶紡輪。有的遺址出土陶紡輪的數量較多，如河宕遺址出土了126件。東莞村頭遺址出土的數量也較多，灶崗遺址出土了多種形式的紡輪⁽⁴⁾。

沙丘遺址出土的石器有鐮、斧、鑿、矛頭、鐵、網墜、礪石等，其中石鐮、網墜，礪石的數量較多，石鐮以梯形鐮和長身鐮為主，有肩鐮少。礪石以小型單面或幾面磨有多道凹槽的為多。個別遺址還有打製石器伴出；貝丘遺址的石器有鐮、斧、鏟、鐵、鑿，鐮最多，但以有肩、有肩有段，有段為多，梯形或長形鐮少。只有個別遺址偶見網墜。貝丘遺址還有以獸骨製作的鐮、鑿、錐、叉、針、鐵等。

沙丘遺址出土的裝飾品有以石、水晶或玉製作的環(包括T形環或稱有肩環)、玦、穿孔器、管、墜飾等；貝丘遺址出土的有石環、石玦、水晶塊或牙雕及骨製的裝飾品等。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珠江三角洲地理環境較為複雜。貝丘遺址背靠大陸，面臨珠江水系及其支流，食物的來源較為豐富；沙丘遺址遠離大陸，大多在古代的孤島上，只能以水產資源為主。這一差別反映在生產工具上則是貝丘遺址的形式較多，沙丘遺址相對較為單調。貝丘遺址極少見網墜，沙丘遺址則普遍有網墜。1994年3月至5月發掘的珠海平沙棠下環遺址，在600平方米的探方內出土了近400多個網墜。⁽⁵⁾還有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香港及附近的島嶼上發現不少網墜，而深圳到目前一共只發現3個網墜，其中2件出於山崗遺址，一件出於沙丘遺址(據深圳市博物館副館長楊耀林先生統計)。這可能與深圳背靠大陸，先民們已有農耕經濟作依靠有關。這種現象反映在陶器種類上是貝丘遺址的泥質陶比例較高，而作容器的圈足罐也以貝丘遺址的為多。

珠江三角洲的沙丘、貝丘或山崗台地遺址儘管由於各方面的原因，相互之間仍存著各

方面的差異。但這些遺址出土的石器均以小型生產工具為多，且以石鏃為主，大型生產工具極少。說明他們都是以漁獵經濟為主，延續時間較長。至青銅時代其農耕經濟仍不怎麼發達。這類遺址與粵北、粵西、粵東同時期的文化遺存相比，有著較大的差距，顯得較為落後。

二 西、北江流域先秦遺址的分佈和特徵

在新石器時代早期，西、北江流域的石灰岩溶洞曾是先民的棲息之所。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到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既相互聯繫又有明顯差別以農耕經濟為主的經濟類型。⁽⁸⁾

西、北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遺存的經濟形態是以採集狩獵為主，主要分佈於封開、始興、仁化、英德、曲江、連南、羅定、懷集、韶關等市縣和漠陽江上游陽春市的石灰岩溶洞中。有學者將其分為無陶器共存和有陶器共存代表新石器時代早期不同階段的文化遺存⁽⁹⁾。其共同特點是以石灰岩洞作為棲息之所。以打製石器作為主要生產的工具。晚期出現部分刃部磨光的石器和燒造火候較低，表面或飾繩紋的陶器。這類遺址大都有螺、蚌、蚌殼的堆積，堆積中夾有豪豬、野豬、水鹿、麂、熊、豹、水牛、獼猴等動物的烘骨化石。部分洞穴遺址還出有輕度石化的人骨。

北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晚期的文化遺存可以石硤文化為代表。石硤文化是七十年代在曲江縣馬坑鎮獅子岩硤遺址中首先發現和發掘，經蘇秉琦先生等認真排比分析後確認的。石硤遺址先後發掘面積共3000多平方米，清理了108座墓葬。從地層堆積和墓葬出土遺物看，早於石硤文化的一期遺存距今約5500年，晚於石硤文化的墓葬和遺物約相當於夏至春秋。其中以曲尺紋、長方格紋組合的印紋軟陶，與較多磨光器共存為特徵的中層堆積約相同於中原夏商時期；以夔紋、雲雷紋、方格紋組合的印紋硬陶，與少量磨光石器、青銅器共存為特徵的文化遺存，為西周

至春秋的文化堆積。該遺址發現和發掘後，廣東考古工作者圍繞此類遺存開展了廣闊的調查、試掘、比較、研究。從目前的資料分析，石硤文化是一種分佈於粵北地區，具有鮮明地方特徵，明顯區別於周鄰地區同時期文化類型的文化遺存，其主要特徵表現在：

甲 特殊的埋葬方式

人死後均埋於氏族公共墓地，流行遷葬，用竹木柴木烘烤墓坑。二次墓葬內有兩套隨葬品，一套破碎不全，是從一次墓葬中遷來，另一套完整無缺，是二次埋葬時新置入的。

乙 精緻實用的石質生產工具

石器的種類有鏃、鏃、鏃、鏃、鏃、鏃及少量的石錐、石網墜、石片、礪石等。其中前幾類石器數量多，選料講究，磨製精細。製作石器的人已熟練掌握了切割、鑽孔技術。各類器物在用途上顯然有一定的區別。

丙 形式多樣的陶器

陶器的種類有鼎、釜、甑、鬲、三足盤、豆、壺、杯、盂、觚形器、罐、甕、器蓋等。其數量之多，品種之齊，製作工藝之先進是目前廣東同時期其它遺址所不見的。

丁 品種齊全的裝飾品

裝飾品有琮、璧、環、玦、簪、璜、管壁、珠、墜飾、圓片飾、綠松石等。從製作技術上看，石硤文化的先民們已熟練地掌握了不同質料，不同硬度玉石料的切割，打磨、雕刻，鑽孔、拋光等技術⁽¹⁰⁾。

石硤遺址出土的各類遺物和墓內出土的碳化稻穀，說明這類遺存的經濟形態以農耕為主，採集捕撈為輔，種植稻穀是他們的主要食物來源。

西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晚期早段的遺存有重要廣利蜆殼洲遺址，該遺址位於珠江三角洲的頂端。1986年的試掘和1987年底至1988年的發掘，在出土的少量陶片中，以飾粗細繩紋砂陶為多，素面或飾刻劃連弧紋，拍印小方

格紋等和繪赭紅色的泥質陶為少。但其墓葬的埋葬方式引人注目，在發現的24座墓葬29具骨架中，一座為蹲葬墓，一座為雙手後剪俯屈肢葬，餘全部為側身屈肢葬⁽¹³⁾。這種埋葬方式為廣東首見，與珠江三角洲貝丘遺址中發現的仰首直肢的埋葬方式不同，而與西江上游廣西桂林、柳州、南寧等地同期墓葬的埋葬方式相似。

西江流域的封開、德慶等縣境內，還有稍晚於石峽文化的烏驪嶺類型文化遺存。其特徵為：

甲 墓葬均選擇於山脊上

乙 盛行二次遷葬

墓坑小而殘，分佈密集，排列有序。1990年初發掘的封開縣杏花鎮烏驪嶺墓群，在150平方米的範圍內分佈著111座墓，墓坑經火燒，隨葬品均從一次葬墓中遷來，殘碎不全，陶器無一可以復原。

丙 隨葬品少

在已發掘或試掘的此類墓中，隨葬品都很少。烏驪嶺111座墓中，出土可辨器形的石器60件(餘8件風化嚴重，無法辨認)，較大型的鐻、鏹、斧只有10件，餘為小型石器，其中小石鐻30件。陶器的器形非常單調，夾砂釜鼎、盆鼎共96件，佔陶器總數101件95%多，另有泥質圈足盤4件，紡輪1件。夾砂釜鼎、盆鼎以及小型石器為主的生產工具均成了烏驪嶺類型文化遺存的主要特徵⁽¹²⁾。烏驪嶺類型的遺存是一種落後於石峽文化的文化遺存。這類遺存的經濟也是以農耕為主，採集捕撈為輔。

除了這兩類遺存外，在西、北江流域的許多縣市，普遍發現了相當於夏商至春秋戰時期的墓葬和遺址。出土陶器的器形，紋飾和青銅器的品種基本相似，反映出隨著生產力的發展，文化面貌已基本趨於一致。

三 珠江三角洲先秦文化之源初探

「人類所賴以生存的經濟活動，是在一定

的客觀條件下進行的。生產的對象不同，就決定了生產工具的不同」⁽¹³⁾。廣東北部和西北部山高林密，地形多變。珠江三角洲水網密佈，在古代那漏斗狀的海灣內大小島嶼星羅棋布。生活在這些地區的先民們，為適應生活環境，不得不採用不同的生產方式，「製器造物，創立文化，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所在社會共同傳統。比較閉塞的新石器時代，一定時期和地域內形成的文化傳統更具特性。於考古學所見，則為留下的一群特定面貌的實物遺存」⁽¹⁴⁾。

從前面的介紹，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生產生活於珠江三角洲和西、北江流域的先民們都給我們留下了一群群具有強烈地方特徵的實物遺存。西、北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的人們以石灰岩溶洞作為棲息之所，「生產了一套頗為不同的器物：礮石砍砸器、繩紋陶器，以獸骨和漁獵形式出現的豐富的符獵與漁撈的證據。可能從事若干農耕，主要作物當是稻米和根莖類作物」⁽¹⁵⁾。此後，在北江流域出現了石峽文化和一批早於或晚於石峽文化的文化連存；在西江流域出現了烏驪嶺類型遺存和早於或晚於它的文化遺存；珠江三角洲則出現了以貝丘和沙丘遺址為代表的文化遺存。這一群群代表不同的地區、不同時期，又具有鮮明特徵的文化遺存，說明他們已離開了洞穴，前者過上了以農耕為主，採集捕撈為輔的經濟生活，後者則仍過著以漁獵為主，農耕為輔的經濟生活。

珠江三角洲和西、北江流域的古代文化的關係，就目前的考古文化來看，仍能找到某些相似之處：

(一) 珠江三角洲早期的貝丘或沙丘遺址中，有的有打製石器出土。如增城的金蘭寺、深圳大鵬咸頭嶺、大黃沙、中山南蓢龍穴等遺址中有砍砸器、敲砸器、尖狀器、石錐、石片等⁽¹⁶⁾。雖然打製石器不多，又為大批磨製石器所取代，但仍能看到剛從新石器時代早期過渡到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存中還保留有早期的痕跡。估計這些生產工具的製作和使用應

源於西、北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存。

- (二) 在珠江三角洲的遺址中還有一些彩陶圈足盤出土。中山龍穴、香港大灣等遺址出土較多，其他遺址出土較少。這類陶器與黃河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大量出土彩陶的情況相比，顯然沒被珠江三角洲的先民廣泛採用。這些彩陶圈足盤源於何處，有的說源於湖北的大溪文化，有的認為源於湖南的湯家崗⁽¹⁷⁾。然而在西、北江流域，除了西江下游的蜆殼洲遺址有少量發現外，其他地方尚未見到。在石岐下層出土的三萬多片陶片中，「圈足盤達4000多片...，這類鏤孔矮圈足盤的型制，與珠江三角洲沿海一帶新石器時代中期的矮圈足盤，彩陶圈足盤頗為相似」⁽¹⁸⁾。這一比較至少在目前來說是值得重視。

- (三) 在西、北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大量存在的三足器，在珠江三角洲極少發現。除三水銀洲發現一件罐形鼎較大外，其它都顯得較為矮小。這種現象可能與生活環境有關係。在西、北江流域的遺址均是較長期定居的，且是在紅壤土之上，除了釜需挖灶坑外，其他的三足釜或罐鼎、盆鼎等均可在器下直接加柴火蒸煮。在珠江三角洲的遺址中，除了中、北部的遺址大多為長期定居外，生產生活於沿海島嶼的先民們遷徙較為頻繁。因此，我們看到的灶坑，大多是用三塊石頭疊成一個灶坑。陶釜放於其上蒸煮。珠海平沙大虎水井口遺址出土的灶，在三個石頭中間還有一個破損的釜⁽¹⁹⁾。同時，圓底器還容易置於沙丘上而不倒。

雖然珠江三角洲與西、北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某些相似之處，但差別仍是較大的。我們結合自然地理環境和經濟形態分析可以看到，他們在地理位置上的聯繫是最緊密的，在經濟形態上，西、北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存與珠江三角洲新石器晚期至青

銅時代遺存的經濟形態最為相似，都是以漁獵經濟佔主要地位。當然，從生產工具分析，珠江三角洲的農耕經濟的比重比前者可能要大，而西、北江流域新石器時代晚期的經濟形態已以農耕經濟為主。據此，我認為存在著這麼一種可能，即新石器時代早期，生產生活於西、北江流域的先民們，隨著自然環境和生活環境的變化，一部分先民從西、北江流域順江而下，來到了珠江三角洲，這裡豐富的水產資源，使他們原來賴以生存的生產方式能夠在這裡得到繼續發揮。為適應環境，他們創造了以夾砂陶釜為主，兼有罐、鉢、盤等陶器和小型生產工具等為特徵的文化遺存。而留在西、北江流域的先民，隨著環境的變化，生產力的水平提高，外來文化因素影響，創造了以農耕經濟為主的生產方式。反映在生產和生活上，就是成套的大型的石質生產工具和形式多樣的陶質生活用具及品種齊全的裝飾品。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力的水平提高，相互交往的增加，到青銅時代，這些地方相繼出現了青銅鑄造業。樂昌發現的魚鉤石鑄範，珠海、中山、香港等地發現的青銅斧石鑄範以及以曲尺紋、長方格紋組合的印紋軟陶，以雲雷紋、方格紋、變紋組合的印紋硬陶等陶器的出現，表明嶺南地區出現了一個新的文化面貌。

當然，從珠江三角洲東、西郊地區沙丘或貝丘遺址零星的發現中看出，也存在著一種珠江三角洲的古代文化是從那些地方過來的可能。但從珠江三角洲地區古代文化遺存分佈之廣泛，內容之豐富，跨越時間之長，及最近我們在英德市博物館看到該館在附近南山的石灰岩溶洞中採集的夾砂重菱格紋陶片，與中山、珠海一些遺存中出土的相似時，我想，珠江三角洲先秦文化之源在西、北江流域的可能性會更大一些。

註釋

- (1)(2)(3) 李平日等：《珠江三角洲一萬年來環境演變》，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

- (4) 邱立城等：〈東莞村頭遺址發掘的初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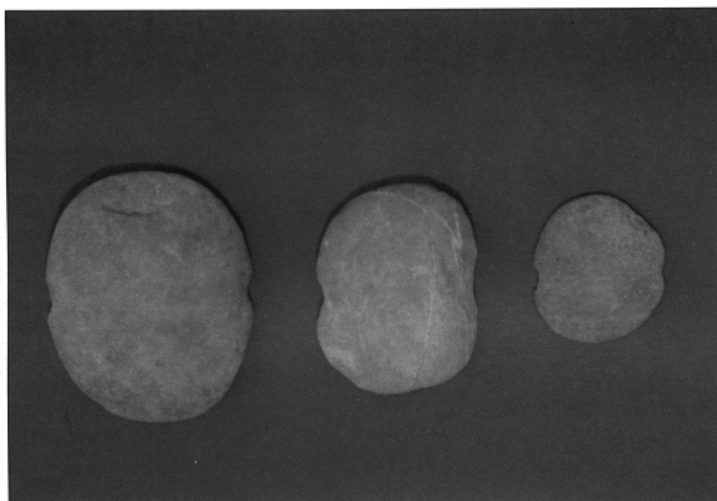
- 收穫》，《廣東省博物館館刊》，第2期；楊式挺等：〈談談佛山河宕遺址的重要發現〉，《文化集刊》，1981年第3期；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南海杜崗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4年第3期。
- (5) 朱非素：〈珠江三角洲貝丘、沙丘遺址和聚落形態〉，《南中國及鄰近地區古代文化研究》，中文大學出版社。
- (6) 見(4)之1,2,4。
- (7) 1994年3月至5月，我所與珠海平沙區文化科聯合對棠下環遺址進行了第一次發掘。在600平方米範圍內，出土文物非常豐富。其中亞腰形網墜是目前珠江三角洲沙丘遺址中最多的一處。石網墜以橢圓形，兩側打出凹痕呈亞腰形為多，也有圓形的。大的長達15厘米，小的有7-8厘米不等，均以河卵石為原料。
- (8)(10) 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曲江石峽墓葬發掘簡報〉，《文物》，1978年第7期。
- (9) 朱非素：〈廣東新石器時代考古若干問題的探討〉，《廣東出土先秦文物》，廣東省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 (11) 廣東省博物館等：〈高要縣龍一鄉覓殼洲貝丘遺址〉，《文物》，1991年第11期。
- (12)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封開縣烏騷嶺新石器時代墓葬群發掘簡報〉，《文物》，1991年第11期。
- (13) 童恩正：〈中國西南舊石器時代〉，《中國考古學研究論集—紀念夏鼐先生秦考古五十週年》，三秦出版社。
- (14) 任式楠：〈略論大溪文化〉，《中國考古學研究—夏鼐先生考古五十週年紀念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6年。
- (15) 張光直：〈中國相互作用圈與文明的形成〉，《慶祝蘇秉琦考古五十五年論文集》，文物出版社。
- (16) 莫稚：〈廣東考古調查發掘的新收穫〉，《考古》，1961年第12期；深圳市博物館等：〈深圳大鵬灣咸頭嶺沙丘遺址發掘簡報〉，《廣東深圳市大鵬沙丘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90年第11期；中山市博物館：《中山歷史文物圖集》。
- (17) 鄧聰：《香港考古之旅》，頁72。區家發：〈略談長江中下游諸原始文化向廣東地區的傳播〉，《嶺南古越族文化論文集》。
- (18) 楊式挺：〈石峽文化類型遺存的內涵、分佈及其與樊城堆文化的關係〉，《紀念馬壩人化石發現卅周年文集》。
- (19) 珠海平沙區，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珠海平沙出土宋元文物》。



圖一 有肩石鐮
Shouldered adz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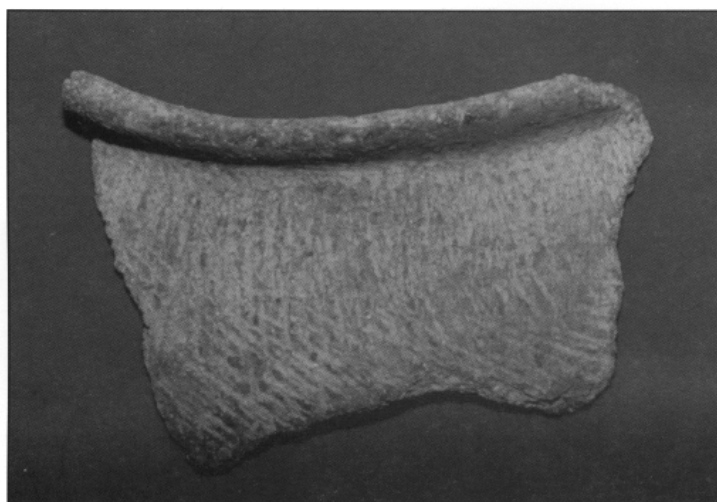
圖二 石矛、鏃
Stone spearhead and arrowhead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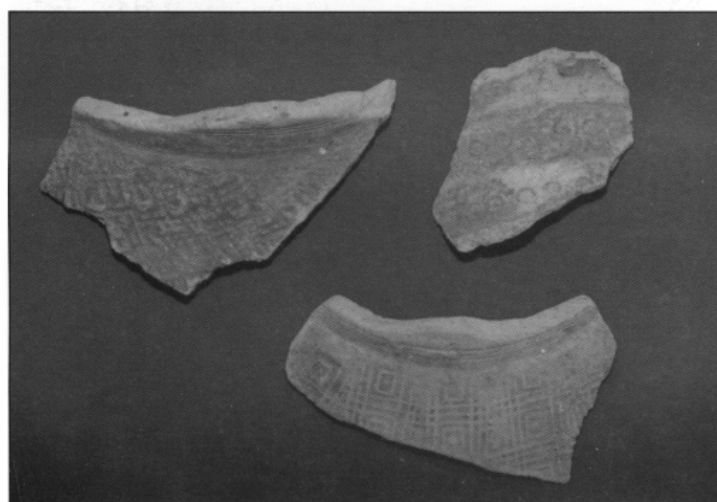
圖三 網墜
Net weigh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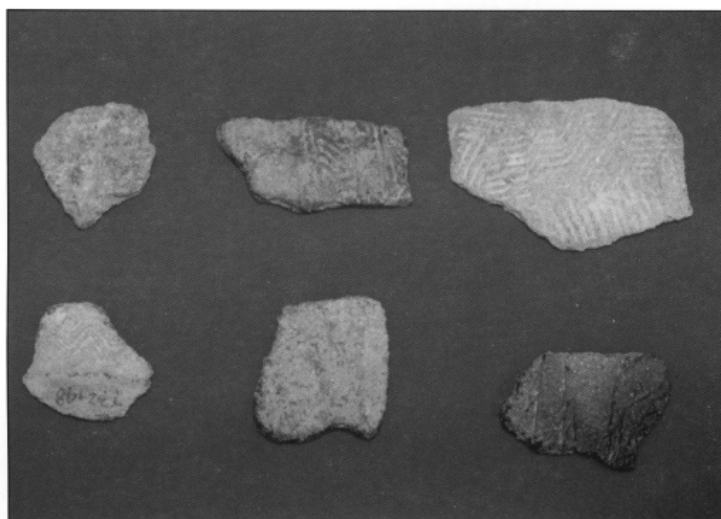
圖四 陶釜
Portion of pottery *fu*-p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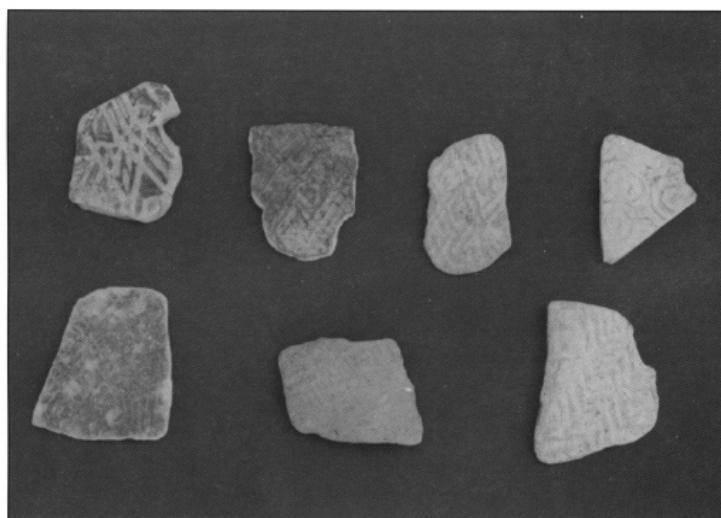
圖五 陶釜
Portion of pottery *fu*-po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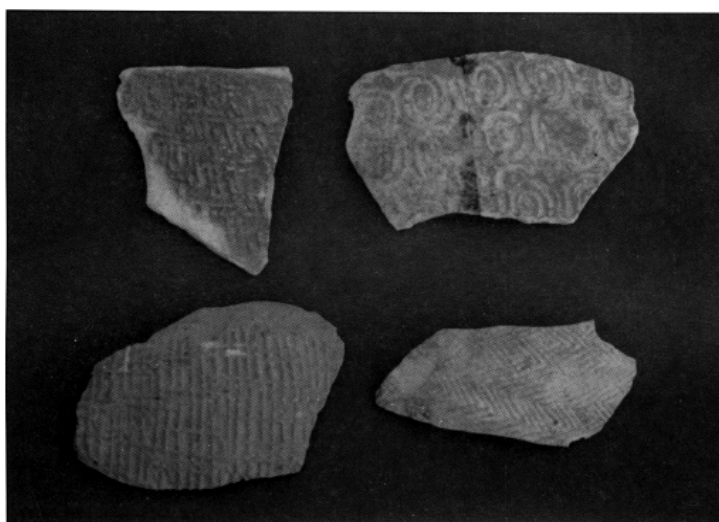
圖六 陶片
Pottery she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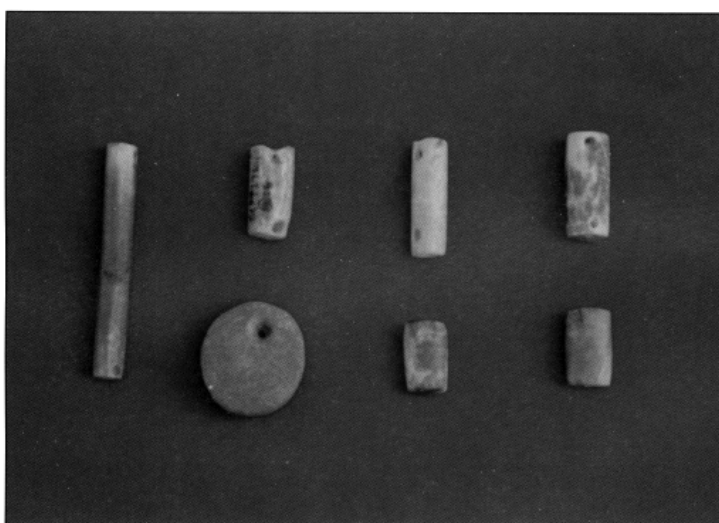
圖七 夾砂陶片
Coarse pottery shard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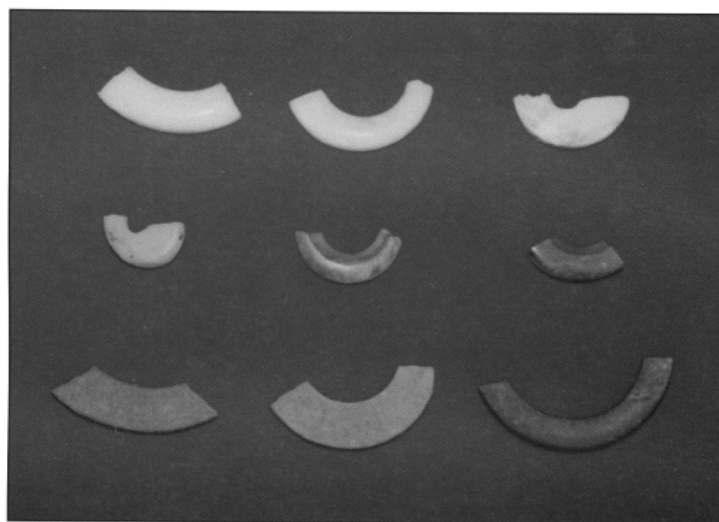
圖八 泥質陶片
Soft pottery shards



圖九 泥質陶片
Soft pottery shards



圖十 石飾
Stone ornaments



圖十一 石(玉)環、玦
Stone (jade) rings



圖十二 有肩石(玉)環
Stone (jade) rings

A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of the Pre-Qin Culture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Area with Reference to its Economic Pattern

Gu Yunquan

[Abstract]

The Pearl River Delta, made up of enormous volume of silt deposits brought down by the three tributaries of Xijiang, Beijiang and Dongjiang, is founded upon a funnel-shaped estuary with Guangzhou marking its upstream end. The tidal waves of the Lingding Ocean into which the estuary opens had helped the barring of deposits to form the delta. Millenniums ago, the fertile alluvium and abundant freshwater supply of this area and its surrounding lands had already attracted the settlement of a population with distinct cultural traits. These people made their living mainly by fishing and hunting, supplemented by farming.

A question arises. Where did this ancient population come from? Some scholars have made extensive researches into archaeological data in hope of finding an answer.

The Pearl River Delta covers an approximate area of 10,000 square kilometres. Over 200 Pre-Qin sites have been uncovered from sandbars, shellmounds and hillocks. Most of them were originally situated on alluvial deposits rising up from the estuary. The cultures represented by these sites are not homogeneous throughout. However, despite the diversity of natural environments, utility artefacts and production implements, the ancient settlements of the delta area shared a similar pattern of economy - fishing and hunting as the principal mode of subsistence and farming the secondary.

Evidence of Neolithic settlements was found in limestone caves around the valleys of Beijiang and Xijiang. These people took to gathering, hunting and fishing as their major means of subsistence. The most typical Neolithic culture in the Beijiang valley was uncovered from Shixia. Around 3,000 square metres of land were excavated and over 108 tomb sites have been brought to light. The uniqueness of this culture is indicated in its burial practice and the large number of finely crafted jade ornaments, pottery and stone artefacts. The most characteristic culture in the Xijiang valley was uncovered from Wusaoling. It was less advanced than the Shixia culture but as long as economy is concerned, both of them exhibit a heavier reliance upon farming whereas gathering, hunting and fishing were of secondary importance.

A research into the natural environments, archaeological remains and economic patterns of the area has made the writer believe that the ancient settlements in the valleys of Xijiang and Beijiang and the delta region probably shared the same ancestry. Environmental changes might have caused some of the settlements in the valleys of Xijiang and Beijiang to move south to the delta where they continued to be hunters and fishers, while those who stayed behind gradually changed their economic pattern to become farmers.